

毛澤東和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

◎ 李 剛

《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以下簡稱《紀要》）是「文革」期間關於高等教育的指導性文件。它是1971年4月15日到7月31日在北京召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結果，會議開了三個月另十七天。會議《紀要》由遲群起草，經過18次的反覆討論，反覆修改，最後由張春橋和姚文元作了兩次修改，經政治局討論定稿。8月13日，毛澤東批示「同意」。¹《紀要》的下發和貫徹促使「文革」期間極「左」教育體制進一步發展。《紀要》基本否定了「文革」前十七年教育工作，錯誤地提出「兩個估計」，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沒有得到貫徹執行」，教育戰線上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的「黑線專政」；知識份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兩個估計」中的兩個「基本」把「文革」前十七年教育戰線說得漆黑一團，是強加給全國廣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鎖」。²

文革結束以後「兩個估計」理所當然遭到批判。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正式撤銷《紀要》的通知，指出：「兩個估計」是「『四人幫』及其親信一手把持下炮製出來的，是錯誤的。它在教育戰線危害極大，流毒很深，應當繼續批判」。³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教育部大批判組」的〈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⁴（以下簡稱〈論戰〉）和署名「《人民日報》本報記者」的《「兩個估計」是怎麼炮製出來的？》兩篇長文，揭露了張春橋、姚文元等操縱會議炮製「兩個估計」的經過。⁵

〈論戰〉指出：「教育戰線是我們黨同『四人幫』長期爭奪的一條重要戰線。對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戰線形勢如何估計，對知識份子狀況估計，這是事關路線、事關全局的大問題。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和廣大群眾認為：十七的教育路線與其他戰線一樣，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始終佔主導地位，教育戰線的知識份子在社會主義事業中的作用及其在政治、思想上的進步應當充分肯定。」而「四人幫」卻把「兩個估計」抬到了嚇人的高度。

他們叫嚷：誰反對「兩個估計」，誰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毛澤東思想。實際情況是怎樣呢？實際情況是：「四人幫」的「兩個估計」，與毛主席1971年對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戰線情況和知識份子情況的估計完全相反。「四人幫」長期嚴密封鎖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對台戲，直至他們的滅亡。現在是把他們的陰謀和事實的真相公之於眾的時候了。

就在1971年夏季「四人幫」把十七年抹得一團漆黑的時候，我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

席針鋒相對地批駁了他們的謬論。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一）十七年的估價不要講得過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執行了錯誤的路線，不是大多數人，是一少部分人。（二）多數知識份子還是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執行封、資、修路線的還是少數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還是認得的，就是愛面子，當人的面不認，背地還是認的，只不過有資產階級思想，過後還是要認的。（三）高教六十條。總的還有它對的地方嘛，難道沒有一點對的地方嘛，錯誤的要批，批它錯誤的東西。毛主席還說：人家是教師，還要尊重他嘛。一講不對就批評，哪能都講對呀，講不對沒有關係，大家共同研究，怎麼能一下子都講對，不可能嘛。毛主席的指示是多麼好啊！這就是毛主席關於教育戰線形勢和知識份子狀況的根本估計。非常明顯，毛主席的估計和「四人幫」的「估計」完全對立，這種對立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尖銳鬥爭的反映。我們要高舉毛主席的旗幟，就必須大力宣傳毛主席的估計，徹底粉碎「四人幫」的反革命「估計」。

在『四人幫』反黨氣焰極端囂張的困難情況下，七月六日，我們敬愛的周總理遵照毛主席的一貫教導，堅決指出：「毛主席的紅線也是照耀了教育戰線的」，「知識份子的大多數是接受共產黨領導的，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對教師隊伍和解放後培養的學生要作具體分析，要辨證地看問題」，「要作個案分析，不然大家就灰溜溜的」。周總理的指示，同樣受到「四人幫」的瘋狂反對。⁶

〈論戰〉一文的核心就是說：「兩個估計」是「四人幫」背著毛澤東搞的，完全背離了毛澤東對教育戰線和知識份子狀況估計的指示，「四人幫」要對「兩個估計」的出台負完全責任，而毛澤東卻沒有責任。我們認為在「兩個凡是」還未遭到批判的歷史條件下，〈論戰〉一文的發表對促進思想解放，促進知識份子問題的解決，特別是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起了巨大的作用，這種偉大的歷史貢獻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論戰〉的寫作方式及其背後的政治思維習慣還沒有擺脫「大批判」的模式，〈論戰〉對具體歷史事實的處理上存在著一定的偏差，缺少科學性。〈論戰〉雖然推翻了反動的「兩個估計」，但同時也開脫了毛澤東對「兩個估計」的出台所應負的責任，不利於對毛澤東晚年極「左」錯誤作深刻的歷史反思。

二

「四人幫」對「兩個估計」出台應負的責任是免不了的。但是「兩個估計」主要還是反映了毛澤東在知識份子問題上一些錯誤思想。建國以後毛澤東對教育戰線一直是不太滿意的。

早在1957年毛澤東就指出⁷：

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的知識份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於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是中產階級的，他們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

1964年2月13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教育工作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康生、林楓、章士釗、陳叔通、郭沫若、許德珩、黃炎培、朱穆之、張勁夫、楊秀峰、蔣南翔、陸平等人。毛澤東在會上指出：教育的方針路線是正確的，但是方法不對。我看教育要改革，現在這樣還不行。他還說，課程多、壓的太重是很摧殘人的。學制可以縮短，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要有娛樂、游泳、打球、課外自由閱讀的時間。毛澤東也批評現行的考試方法，指出現在的是用對付敵人的方法，實行突然襲擊。題目出的很古怪，使學生難以捉摸，還是考八股文章的辦法，這種做法是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贊

成，要完全改變。毛澤東甚至說⁸：

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懂了就有收獲，為甚麼要死記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試試點。

同年6月4日和王海蓉談話時說：「要允許學生上課看小說，要允許學生上課打瞌睡，要愛護學生身體。教員要少講，要讓學生多看。」⁹

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的一次會議上又發表了關於教育制度的講話。他說「現在這種教育制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20年不見稻、梁、菽、麥、黎、稷，看不見工人怎麼做工，看不見農民怎麼種田，看不見商品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他提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於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社會實際。」他認為：「高中畢業後，就要先做點實際工作。但下農村還不行，還要下工廠、下商店、下連隊。這樣搞他幾年，然後讀兩年書就行了。」¹⁰

1966年3月，毛澤東在主持召開黨中央工作會議上批評《二月提綱》時說：「學術問題，我們被蒙在鼓裏，許多事我們不知道。事實上學術界、教育界是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手裏掌握著。現在，大中小學大部分都是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主、富農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壟斷了。」¹¹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毛澤東在《十六條》中指出：「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

1966年5月7日，他在審閱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業、副業生產的報告》後寫給林彪的信中說¹²：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斯諾時說，「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啊，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裏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拋掉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讓他們在那裏，年紀老了，不能幹事了，養起來了。其他的保存，但要跟勞動相結合，逐步逐步來，不要忙，不要強迫，不要強加於人。」¹³

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在會見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時就教育革命問題說：「對資產階級教授我們還得利用，不然我們沒有呀，不過，他們也得聽我們的話，有些人嘴裏也講聽我們的話，但心裏老是埋怨。」毛澤東又說：「過去也有些進步，在教育方面不能講完全不對。但是你剛才講的這一條，就是教育從根本行來一個革命，在最近幾年才開始。」¹⁴

從建國以後毛澤東的一系列講話和指示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兩個估計」和毛澤東的思想精神是一脈相承的。那麼哪個〈論戰〉引用的被「四人幫」封鎖的1971年指示又如何解釋呢？

首先，誰敢封鎖毛澤東的指示？1971年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第五年，毛澤東的身體還沒有甚麼大問題，毛澤東的權利處於頂峰，對局勢能完全控制。毛澤東對1971年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是非常關心的。為了便於毛澤東閱讀，會議簡報是用二號字印刷的，每期皆報送毛澤東。毛澤東1971年8月14日到南方數省巡視，準備解決林彪問題，在臨行前一天，即1971年8月13日批准了《紀要》。甚至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結束一年後，對會議上的一些細節也記得很清楚。1973年7月17日下午，毛澤東接見來華訪問的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周培源隨同被接見。毛澤東對周培源說道：「你的講話有人贊成，有人反對（指周在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綜合大學組座談會上的發言）。」¹⁵周培源補充說：「那個發言後來在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報》上發表了。」毛澤東指名道姓地說：「上海復旦大學的談家楨就不贊成你的文章。」¹⁶毛澤東有各個方面的信息渠道，所以想封鎖毛澤東的講話和指示既不到，而且誰也不敢。況且「四人幫」存在的基本政治資源就是毛澤東的信任，一旦離開毛澤東的支持，「四人幫」就只有垮台。《紀要》的起草人遲群和主要修改人張春橋、姚文元都善於而且極力揣摩了毛澤東的意圖的高手，他們是決不敢封鎖毛澤東的指示的，或許在小方面有出入，但在大方向上是不會有大變化的。因此「兩個估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迎合了毛澤東的意見。

那麼那個1971年的指示從何而來？到底是不是毛澤東的指示？

據參加〈論戰〉一文寫作的《人民教育》總編輯吉偉青回憶¹⁷：

在〈論戰〉寫作的後期，正當寫作組和部領導感到稿子顯得有點平淡，批判的力度還不夠深刻的時候，偶然發現，毛主席在1971年全教會期間，對教育工作問題會同「四人幫」部分成員談過一次話，針對「兩個估計」發出了重要指示。可是「四人幫」嚴密封鎖了這個指示，一直未向與會同志傳達，只在「四人幫」分管科教工作的極少數骨幹和親信中作過傳達。首先發現這條線索是《人民教育》編輯組長孫長江，他當時是審查「四人幫」在教育部的余黨骨幹份子薛玉山的專案組組長。他在查看薛的筆記本時，發現筆記本上記錄不全的毛主席指示，立即向李琦同志作了匯報。教育部黨組隨即請示中央審查辦，請求查看遲群、謝靜宜（遲群、謝靜宜當時是「四人幫」在教育戰線的親信，任科教組長、副組長）的筆記本。由孫長江同志負責審閱核對他們筆記本中關於毛主席1971年全教會期間對教育工作指示的紀錄。整理後，經寫作組研究建議，報教育部黨組請示喬木同志同意，決定寫進稿中，用毛主席對教育戰線和知識份子的評價，有針對性地駁斥「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的謬論。

但是，寫作組在中辦和中央檔案館都沒有查到毛澤東的這個指示原文，所以在發表時稱為「毛主席的指示精神」。¹⁸

無法搞清毛澤東是在何時、何地 and 何種情況下發出這個「重要指示」。可見，作為〈論戰〉核心證據的所謂的毛主席的指示雖然不能說沒有，但在可靠性上是有問題的。連當時教育部「大批判組」的人也不敢理直氣壯地說「這就是毛主席的指示」，而只能說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何況當時對毛澤東的「重要指示」的記錄和傳達是極其嚴肅的大事，毛澤東對遲

群等人的私下談話恐怕不是甚麼「重要指示」，甚至不是甚麼「指示」。

即使我們承認毛澤東的這個「指示精神」，也無法從中得出毛澤東反對「兩個估計」的結論。「（一）十七年的估價不要講得過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執行了錯誤的路線，不是大多數人，是一少部分人。（二）多數知識份子還是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執行封、資、修路線的還是少數人。」實際上《紀要》開頭部分是肯定十七年教育的所謂「巨大成就」的，但這並不妨礙《紀要》馬上接著就講「資產階級在教育戰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多數知識份子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

實際上周恩來對毛澤東和「兩個估計」的關係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周恩來也不得不講¹⁹：

儘管有些人是解放後當教員的，但由於教育制度是舊的，方針、政策是舊的，雖然是解放後培養出來的，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說「資產階級專了我們的政」是對的，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了我們學校」是一個意思，他們是搞修正主義的。不然，為甚麼在教育上沒有徹底改革呢？為甚麼毛主席的號召沒有執行呢？

周恩來作為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領導小組的負責人，他必須把毛澤東的意見貫徹下去，自己心裏未必同意。1956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會議上，周恩來代表中央作《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明確宣布：「我國的知識界的面貌在過去六年來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²⁰但是毛澤東在1957年3月的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出：知識份子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²¹完全推翻了周恩來的正確意見。周恩來對毛澤東在知識份子問題上一貫立場是非常清楚的，他不得不說「違心話」。如果真的有毛澤東的反對「兩個估計」的指示，哪怕是「指示精神」，周恩來怎麼可能不把它拿來打擊「極左勢力」呢？

即使在當時情況下周恩來對「兩個估計」還是有保留的，他說：「但不能說主席的紅線沒有射進學校。學校不能脫離社會（從整個國家來說，十七年來，毛主席的紅線還是佔主導地位的）。主席的紅線還是照耀著學校的，而且有些時候還是有力的。對教師隊伍和十七年教育出來的學生要有個正確的評價。要說清楚教師、學生隊伍大多數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接受黨的領導的。不回答這個問題，這個文件拿下去就不能起動員作用。」²²

從以上的多方面情況看，「兩個估計」是《紀要》的核心觀點，反映了晚年毛澤東對知識份子問題的基本認知。這種錯誤思想之所以長期得不到批評研究，是因為在思想界和學術界乃至主流意識形態中長期存在的對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名義上否定，實際上回避」的態度。這種處理歷史問題的方式已經成為一種所謂「宜粗不宜細」的歷史敘事模式，極大的阻礙了對當代中國歷史反思的深度和精確性。

註釋

- 1 江蘇省檔案館館藏江蘇省革命委員會教育局檔案（卷號：短期065）。
- 2 李剛：〈1972—1976年間中國高等教育的過渡性分析〉，《社會科學研究》，2002年第5期，第127頁。
- 3 〈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全鑒·第五卷（1976—1988）》（北京：團結

- 出版社，1996），頁5343。
- 4 〈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人民日報》，1977年11月18日，第1版。
 - 5 〈「兩個估計」是怎麼炮製出來的？〉，《人民日報》，1977年11月18日，第2版。
 - 6 〈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人民日報》，1977年11月18日，第1版。
 - 7 教育部大批判組：〈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人民日報》，1977年11月18日。
 - 8；9 《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頁32；34。
 - 10 本書編委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全鑒·第三卷（1960—1966）》（北京：團結出版社，1999），頁3453。
 - 11 轉引自金一鳴：《中國社會主義教育的軌跡》（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320—321。
 - 12 毛澤東的這封信產生於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後由林彪轉呈中央，於1966年5月15日轉發到全黨。1966年8月1日，通過《人民日報》社論，將它的基本精神傳播到全國。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學者王年一認為：這封信與《毛澤東致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一起，是了解文化大革命動機的兩把鑰匙。
 - 13 《中華人民共和國春秋實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頁945。
 - 14 《中央首長指示的主要精神》，江蘇省檔案館館藏江蘇省革命委員會教育局檔案（卷號：短期065）。
 - 15 周培源在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綜合大學組座談會上的發言《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核心是反對「理向工靠」，否定理科教學的做法。此文後發表在1972年10月6日的《光明日報》上，文章提出：「工和理、應用和理論都必須受到重視，不能偏廢」，「要批判『理論無用』的錯誤思想」，「充分認識到科學實驗和自然科學理論的重大意義」。「在學校中，基礎科學的教學工作一定要做好，綜合大學理科要對基本理論的研究給予足夠重視」。這封信擊中了江青等人在教育、科技領域中鼓吹極左思潮的要害，使在「兩個估計」重壓下的廣大知識份子受到很大的鼓舞和啟示。在社會上特別是在教育、科技領域裏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和反響。文章涉及的直接內容是教育和科技，但其重要意義卻在於一些重大的、敏感的問題上，對極左思潮和「左」的錯誤提出了公開挑戰。
 - 16 奚學瑤：〈周培源與北大的不解情緣〉，《中華兒女》，2002年10期，頁73。
 - 17；18 吉偉青：〈「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發表的前前後後——推翻「四人幫」的「兩個估計」親歷記〉，《黨的文獻》，2002年第1期，頁74；75。
 - 19 《中央首長指示的主要精神》，江蘇省檔案館館藏江蘇省革命委員會教育局檔案（卷號：短期065）。
 - 20；2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242—43；254。
 - 22 江蘇省檔案館館藏江蘇省革命委員會教育局檔案（卷號：短期65）。

李 剛 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三期（2003年4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